

供给侧改革驱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献综述

陈子豪, 丁莹

武汉科技大学法学与经济学院, 湖北武汉, 中国

【摘要】本文系统梳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实践路径与实证证据。研究发现, 供给侧改革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绿色低碳转型、要素配置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四大路径作用于民族地区, 且新质生产力培育、绿色金融创新、财政转移支付成为关键驱动变量。现有研究在理论层面对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经济”三重属性的适配性界定不足, 空间效应忽视等局限, 内容层面尚未充分揭示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差异与要素协同机制。未来研究需构建民族地区特色供给侧改革理论框架, 采用多维度微观数据与空间计量方法, 聚焦差异化路径设计与政策长效评估, 为民族地区实现“质效双升”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民族地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 绿色转型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项目“供给侧改革驱动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的动力结构及时空效应研究”阶段成果。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供给侧改革驱动民族地区县域绿色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D202403222014078844 结项成果。

1. 引言

在推进现代化的关键阶段, 民族地区既是我国生态安全屏障、资源储备基地, 也是民族团结进步的核心载体, 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全局成效。从“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纳入“七个聚焦”重要部署, 到进一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 为民族地区破解发展难题指明了方向。

既有研究已初步探讨了供给侧改革与民族地区发展的关联性, 但尚未充分整合绿色发展视角下的区域协同逻辑, 对民族地区特殊禀赋(如生态功能、文化资源、沿边区位)与供给侧改革的适配性分析不足。在供给侧改革与绿色发展构成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完整体系阶段, 民族地区作为生态屏障与经济后发叠加区域, 二者的深度融合具有特殊意义[1]。结合蒋尉关于民族地区绿色低碳转型空间分异的研究可见, 供给侧改革在民族地区的实践需要兼顾区域互补与特色发展[2]。基于此,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 整合供给侧改革、绿色发展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观点, 审视现有研究的方法与局限, 明确未来研究方向, 为民族地区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2. 供给侧改革驱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2.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演进: 从“结构调整”到“系统变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随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持续深化。早期研究聚焦“三去一降一补”的短期政策效应, 黄群慧从“问题-原因-对策”逻辑出发, 将其定义为“针对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错配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 所开展的结构调整与体制机制改革”, 这一观点为民族地区化解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过剩产能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3]。付一虬等基于33个制造行业2001-202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证实, 此类结构性调整使民族地区高耗能行业产能利用率提升[4]。

随着改革深化, 理论视角逐步拓展至“制度供给”与“价值逻辑”。贾康等基于新供给经济学提出,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要素重组”释放发展动能[5], 这一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应用体现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绿色金融制度创新[6,7]。周毅等进一步提出“价值共创共享”的改革目标, 强调供给侧改革需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 这与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目标高度契合[8]。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供给侧改革需要通过集体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 实现“农民增收与区域发展”的价值统一[9]。近年来, 产业链视角与新质生产力理论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新维度。龚刚等构建产业链理论模型证实“微笑曲线”存

在,提出供给侧改革需推动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两端攀升,而新质生产力是实现这一攀升的核心动力[10]。

2.2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核:特殊性与多元目标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界定需兼顾“共性要求”与“区域特性”。从共性看,李建民等指出其核心是“创新驱动、生态优先、协调包容”[11],这与全国高质量发展内涵一致;从特性看,民族地区需额外关注“三大目标”:一是生态安全目标,民族地区作为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需将“生态保护”纳入发展评价[12];二是民族团结目标,吕灿等强调经济发展需服务于社会发展,避免因发展差距加剧民族隔阂[13];三是边疆稳定目标,边疆民族地区需通过沿边开放与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国土安全”的协同[14]。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提升,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成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新增长点。数字经济的“高渗透性、广覆盖性”可突破民族地区地理区位限制[15],使西藏、青海等偏远地区通过电商实现特色产品“出山入海”。刘湘则从低碳经济视角提出,民族地区需立足清洁能源禀赋(如西北的风光资源、西南的水能资源),构建“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贸易”的发展体系[16],这一理论与“空间分异与互补发展”观点相呼应,即民族地区可通过清洁能源跨区域输送,实现“生态价值转化与经济收益获取”的双赢[2]。

2.3 二者耦合的理论逻辑:供给侧改革适配民族地区的三大机制

供给侧改革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耦合,需依托“特色资源转化、生态价值实现、区域协同互补”三大机制。从特色资源转化看,“特色经济战略”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进一步深化[17]。张琦等基于云南普洱茶、宁夏枸杞等案例,构建“政府-企业-合作社-农户”四位一体模式,通过技术赋能与品牌建设,提升民族地区特色农产品附加值[18];丁赛等针对县域文旅产业研究也证实,供给侧改革通过资源整合进行服务升级,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经济优势,实现县域文旅产业正增长[19]。从生态价值实现来看,民族地区需通过“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绿色产业”三重路径,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20]。从区域协同互补来看,供给侧改革

需通过基础设施联通(如西部陆海新通道)、要素对流(如东部技术与西部资源结合),降低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往成本[21],但目前多数民族省区尚未跨越“U效应”拐点,需通过供给侧改革破除市场壁垒[22]。

3. 供给侧改革驱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3.1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结构性矛盾与特殊约束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呈现出整体水平有待提升、结构优化任务迫切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已成为制约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的重要因素[23]。吕灿等进一步揭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短板根源在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并非单一因素导致[13]。从发展动力来看,民族地区多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传统发展动能乏力,亟需依靠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引擎[11]。而在农村发展层面,民族地区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组织功能发挥不充分、实现形式单一、资金支撑不足等多重困境,这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活力释放,也对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制约[24]。上述挑战相互交织,使得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多维度、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供给侧改革作为破解结构性矛盾的核心政策工具,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其推动作用体现在制度创新、要素优化、动力转换等多个维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层面的突破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与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逻辑高度契合[25]。从要素配置来看,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资本、技术、劳动力、制度、土地、民族特色资源六大增长要素,与农户、农村经济组织、企业、政府四大参与主体的有机融合,进而提升产业供给质量与效率[18]。在动力培育方面,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强化科技支撑能力,高起点谋划未来产业布局,正是民族地区供给侧改革中“促创新”的核心要求[11]。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研究则补充了政府职能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优化国土空间规划、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政府行为,能够有效破解边疆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张力,这也为供给侧改革在民族地区的落地

提供了实践方向[26]。综合而言,供给侧改革通过制度创新、要素整合、科技创新赋能与政府职能优化的多元路径,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未来仍需进一步细化政策设计,增强政策适配性。

3.2 定性研究的案例实践与局限

3.2.1 产业结构优化驱动绿色转型

供给侧改革通过产业结构系统性调整推动民族地区绿色转型的路径,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得到较多印证。农业供给侧改革应围绕“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核心任务,推动农业从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型,这一改革思路在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中得到有效验证[27]。基于供给侧视角构建的政府、企业、合作社、农户“四位一体”产业精准扶贫模式,正是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组织形式与要素配置,显著提升了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供给质量与绿色发展水平[18]。在工业领域,供给侧改革的绿色导向同样成效显著,环保限产、落后产能淘汰等政策工具的运用,有效改善了民族地区高耗能行业的供需失衡状况,推动工业发展向低碳化转型[4];刘湘则结合民族地区资源禀赋特征,提出通过产业结构轻型化、能源结构清洁化的双路径,破解传统发展模式下的“高碳依赖”困境,为工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具体方向[16]。

区域协同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延伸,从空间分异视角提出,民族地区应通过完善清洁能源空间布局、强化跨区域电网建设,深化与东中部地区的产业互补发展[2],这一观点与郑长德提出的“经济互嵌式发展”理论高度契合,均强调通过产业嵌入与跨区域融合提升民族地区产业竞争力与绿色转型效率[28]。不过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多数聚焦单一产业或特定区域的转型实践,缺乏对民族地区三大产业协同绿色转型的系统性实证分析,且针对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协同效应的长期跟踪研究较为匮乏,难以全面揭示转型过程中的动态规律。

3.2.2 创新赋能培育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作为供给侧改革激发增长动能的核心载体,在民族地区经济追赶型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从后发优势理论出发,提出民族地区应依托颠覆性创新突破传统发展路径,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21];张智等的实证研究进一步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数据支撑,其构建的包含科学技术、生产要素、产业结构

等多维度的新质生产力评价体系,证实了新质生产力提升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改善的显著促进作用[29]。在创新驱动的具体路径上,民族地区应立足自身发展阶段,强化科技支撑能力建设,高起点谋划未来产业布局,从源头培育新质生产力[11];王韶华等则通过实证分析指出,研发投入增加与技术引进是推动民族地区工业绿色增长的重要动力,但需高度关注技术来源的异质性[1]。国内技术转移对民族地区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尚未显现,这一发现为精准制定差异化创新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当前研究仍存在三方面局限:一是研究视角多聚焦技术创新单一维度,对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的作用关注不足;二是计量分析多采用静态模型,难以充分反映创新驱动的动态演化过程与路径依赖特征;三是未能充分考量民族地区人才短缺、研发基础薄弱、创新生态不完善等特殊约束条件对创新效果的影响,导致部分政策建议的实践适配性不足。

3.2.3 要素配置优化与金融支撑

供给侧改革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强化关键要素保障,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其中金融、土地、劳动力等核心要素的改革突破尤为关键。具体来看,在金融要素配置层面,贺捷依托县域金融改革案例,提出“政策引导-机制创新-风险防控”三维框架,为破解民族地区金融产品同质化、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提供了有效路径,显著提升了金融供给的精准性[30];王亭聚焦农业绿色发展需求,提出从完善农业绿色金融体系、健全基层金融服务网络、实施差异化配套支持政策三个维度协同发力,为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提供资金保障[7];陆岷峰则立足共同富裕目标,强调普惠金融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深化金融监管改革、融合社会服务功能等举措,破解金融供给失衡难题,让金融服务更广泛覆盖弱势群体与发展薄弱领域[31]。在土地、劳动力等基础要素改革方面,李双成研究发现,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民族地区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释放土地要素活力的核心措施[32];孔祥智的研究则聚焦农村发展场景,提出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民族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与要素保障[6]。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短板:

一方面,对各类要素间的交互作用探讨不够深入,例如金融支持与土地流转、人才引进之间的协同效应尚未得到充分的实证检验;另一方面,对民族地区要素流动过程中的成本构成、制度障碍等问题缺乏系统分析,导致相关研究结论难以直接转化为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的针对性解决方案。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梳理了供给侧改革驱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献,深入探讨了改革的理论基础、实践路径与核心作用机制,全面总结了其在民族地区的应用成效与研究现状。研究表明,供给侧改革作为破解民族地区结构性发展矛盾的关键措施,从多维度层面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在产业层面,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绿色转型与区域协同,破解了传统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的瓶颈;2.在创新层面,通过培育适配性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支撑,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可持续动力;3.在要素层面,通过优化金融、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配置效率,补齐发展短板。综合来看,供给侧改革在促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创新赋能与要素优化配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同时,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的深化空间:一是对不同类型民族地区(资源型、生态型、沿边型)的差异化适配性研究不足,多数成果聚焦共性问题,缺乏针对区域禀赋特征的精准分析;二是对改革效果的评估多集中于短期经济效应,缺乏基于长时段面板数据的动态追踪,难以全面揭示改革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共同富裕等维度的长期影响;三是对要素协同、政策协同的内在机理探讨不够深入,未能充分解释多要素、多政策如何联动发力以提升改革成效。

基于此,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进一步扩展:一是强化跨区域比较分析,结合不同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生态条件与文化特色,精准识别改革的差异化实施路径与适配模式;二是构建长时段追踪评估框架,依托微观面板数据,量化供给侧改革在经济增长、生态改善、社会融合等多维度的长期效应;三是深化机制研究与政策优化,聚焦要素协同、政策衔接等关键问题,探索更为精准、高效的改革措施,为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实践价值的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参考文献

- [1]王韶华,张伟,何美璇,等.供给侧改革驱动绿色发展的文献综述[J].商业经济研究,2020,(14):186-189.
- [2]蒋尉.空间分异与互补发展:民族地区绿色低碳转型研究[J].民族研究,2025,(05):16-34+138-139.
- [3]黄群慧.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工业经济,2016,(09):5-23.
- [4]付一虬,孙嘉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去产能”政策有效性探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5(10):200-208.
- [5]贾康,苏京春.论供给侧改革[J].管理世界,2016,(03):1-24.
- [6]孔祥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J].改革,2016,(02):104-115.
- [7]王亭.供给侧改革下绿色金融支持河南绿色农业发展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5,(07):110-111.
- [8]周毅,吴焯,于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价值逻辑[J].中国金融,2025,(13):95-96.
- [9]康瑞宸.以乡村振兴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路径探析[J].农业经济,2025,(08):95-96.
- [10]龚刚,王雪松.论产业链视域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南方经济,2024,(12):1-21.
- [11]李建民,贾斌昌,王金田.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经济纵横,2022,(12):104-111.
- [12]郑长德.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路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6(05):98-106.
- [13]吕灿,李敬.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民族学刊,2022,13(12):134-145+160.
- [14]柴小君.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J].西藏研究,2023,(05):11-16+159.
- [15]黄泰岩,李文杰.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01):104-112.

- [16]刘湘.民族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现状与路径探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2, (06): 154-161.
- [17]庄万禄.论西部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战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01): 17-21.
- [18]张琦, 张涛, 贺胜年.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探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 40(01): 97-104.
- [19]丁赛, 王国洪, 丰晓旭, 等.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县域文旅产业发展分析[J].民族研究, 2023, (02): 56-70+140.
- [20]郑长德.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视域的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减贫政策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36(01): 115-121.
- [21]郑长德.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互嵌式发展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 2024, (01): 88-98.
- [22]刘艺卓, 周晓剑, 尹文渊.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经济效应分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01): 105-114.
- [23]李丽媛, 胡玉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 2021, 42(02): 127-134.
- [24]李娜.民族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J].贵州民族研究, 2023, 44(02): 155-162.
- [25]郑长德.中国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研究[J].民族研究, 2011, (04): 15-24+107.
- [26]付秋梅, 李俊清.边疆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张力与调适[J].广西民族研究, 2024, (02): 153-165.
- [27]姜长云, 杜志雄.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01): 1-10+144.
- [28]郑长德.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追赶发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5(11): 90-97.
- [29]张智, 廖中伟.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 2025, 46(02): 113-119.
- [30]贺捷.县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J].中国金融, 2025, (12): 103.
- [31]陆岷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耦合路径及改革进路[J].湖湘论坛, 2025, 38(03): 51-61.
- [32]李双成.以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中国土地科学, 2025, 39(08): 148-150.